

英汉翻译散论

东 著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广东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成果



英汉翻译散论

■ 余东 著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英汉翻译散论/余东著.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5.7
ISBN 978-7-307-16003-3

I. 英… II. 余… III. 英语—翻译—文集 IV. H315.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21329 号

责任编辑:谢群英 刘 芬 责任校对:李孟潇 版式设计:马 佳

出版发行: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cbs22@whu.edu.cn 网址:www.wdp.com.cn)

印刷: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9.75 字数:228千字 插页:1

版次:2015年7月第1版 2015年7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7-16003-3 定价:29.00元

版权所有,不得翻印;凡购买我社的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一、绪 论	001
二、翻译学：有名无实	005
1. 问题的提出	/ 005
2. 翻译与语言	/ 005
3. 翻译理论的民族性	/ 006
4. 翻译学名与实	/ 007
5. 结语	/ 009
三、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关于翻译标准的思考	011
1. 翻译标准的可行性	/ 011
2. 追求善译是一种天性	/ 014
3. 翻译标准是一个过程	/ 015
4. 结语	/ 016
四、变通意识与国粹心态：葛浩文的文学翻译观解读	020
1. 引言	/ 020
2. 严肃的文学翻译与葛浩文的变通	/ 020
3. 中国文学的特色与葛浩文的“背叛”	/ 022
4. 葛浩文的翻译	/ 024
5. 葛浩文给我们的启示	/ 026
五、谈文学翻译的客观性	029
1. 戏剧性与戏剧翻译	/ 029
2. 戏剧性与方言	/ 030
3. 戏剧性与音韵	/ 031
4. 戏剧性与动作性	/ 033
5. 结语	/ 034

六、论文学翻译中的信息转换 ————— 036

1. 引言 / 036
2. 翻译与信息 / 036
3. 信息的分类 / 038
4. 文学翻译信息转换的特征 / 040
5. 信息性与文学翻译的客观性 / 041
6. 结语 / 044

七、论翻译思维 ————— 046

1. 引言 / 046
2. 翻译过程的思维特征 / 046
3. 翻译思维的隐喻认知属性 / 048
4. 翻译思维与其他思维 / 050
5. 结语 / 052

八、空位现象与翻译的虚实观 ————— 055

1. 引言 / 055
2. 空位与语篇衔接 / 055
3. 虚实差异的认知机制 / 057
4. 翻译：虚与实的统一 / 058
5. 结语 / 062

九、试论形合与意合的平衡机制 ————— 064

1. 汉语重意合，英语重形合 / 064
2. 形合意合的标准问题 / 065
3. 形合意合是平衡的 / 067
4. 结语 / 068

十、论汉语政论翻译中的取与舍 ————— 071

1. 翻译标准的多元化 / 071
2. 汉语政论英译的取舍 / 073
3. 求真有法，取舍有度 / 076
4. 结语 / 078



十一、论翻译策略的文化内因 ————— 080

十二、论中国传统翻译诗学的文化通约性 ————— 085

1. 诗学的概念 / 085
2. 翻译诗学与文化内因的关系 / 086
3. 中国翻译诗学的发展与变化 / 087
4. 结语 / 089

十三、连贯有真伪之分吗? ——论连贯与翻译 ————— 092

1. 问题的提出 / 092
2. 何谓连贯 / 093
3. 英汉文本连贯模式不同 / 094
4. 连贯与翻译 / 096
5. 结语 / 101

十四、论汉语政论文的文采及其英译 ————— 103

1. 政论隐喻的特点 / 103
2. 政论隐喻的类型 / 105
3. 政论隐喻的翻译方法 / 107

十五、汉语政论文的英译模式探讨 ————— 111

1. 意识形态对翻译的操控 / 111
2. 意识形态与阅读位置 / 112
3. 汉语政论的英译模式 / 113
4. 认同度: 翻译意识形态的规范 / 115
5. 结语 / 116

十六、论散文翻译中的节奏 ————— 119

1. 英汉散文的节奏构成 / 119
2. 散文节奏的审美功能 / 121
3. 英汉散文节奏在翻译中的再现 / 123

十七、论中国传统译学的隐喻思维 ————— 127

1. 引言 / 127
2. 隐喻的普遍性 / 127

3. 中国传统译学的隐喻思维	/ 128
4. 中西译学比较	/ 129
5. 隐喻体系的稳定性	/ 130
6. 结语	/ 131

十八、翻译赏析与批评：以《翻译与翻译过程：理论与实践·绪论》的翻译为例 —— 133

1. 理解的三种境界	/ 133
2. 理解是变通之本	/ 135
3. 翻译过程的感性模式	/ 138
4. 结语	/ 140
附录	/ 141

后 记 —— 150

一、绪 论

自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全面推行改革开放,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各个领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改革的浪潮中,翻译为国人扣开了宽敞明亮的窗口,使国人看到了外部世界,也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为改革开放立下了汗马功劳。与此同时,改革开放也给翻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翻译事业繁荣,翻译研究兴盛,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新理踵出,蔚为大观。

中国正经历着有史以来第四次翻译高潮,所涉行业之广,翻译量之重,意义之大,堪称史无前例,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时期的翻译规模都无法与之相比。从中国历史上的前三次翻译高潮来看,每次翻译高潮的背后必有强大的政治和经济推力,国事盛则译事盛,译事盛则译学兴。

第一次翻译高潮以佛教翻译为标志,历经东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延续近千年。马祖毅将这段翻译史分为草创阶段(公元18—316年),发展阶段(公元317—公元617年),以及全盛阶段(公元618—公元906年)(马祖毅,1998)。佛教之所以能在这一期间传入中国,主要原因有二:一是魏晋后期,胡人入侵中国北方,异族涌入,带来了异域文化,也带来了佛教。佛教在东汉初入之时,主要只是满足西域胡商的宗教信仰,随着胡人入侵,逐渐与汉族同化,佛教始为汉民族普遍接受,从此儒道释开始相提并论;二是在五胡乱华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国家动乱,佛教适时地提供了饱受苦难的人们精神慰藉,使佛教一时大为盛行,并深深影响此后千百年的中国(黄仁宇,1997:83)。佛教的传入意味着佛经翻译的繁荣,伴随而来的便是译者们对翻译的探讨,如“文”“质”之争,道安论五失本,三不易,玄奘的五不翻,赞宁提出的六例等。

明末清初的第二次翻译高潮主要受到宗教因素的推动。罗马教廷派耶稣会士前来东方进行宗教扩张,为了不使中国人感到他们有侵略的意图,采取了“学术传教”的方针,与徐光启等中国人合作介绍西方学术,主要翻译人文社科和自然科学书籍。所以,这次翻译高潮也称为科技翻译高潮。从意大利人利玛窦来中国(1582年)开始至18世纪止,延续约一个多世纪。起因虽然主要是宗教性质的,客观上却促进了科学文化的交流,也活跃了翻译。徐光启等人的译论不多,但有特点。一是跳出了宗教翻译的藩篱,二是将翻译理论与爱国主义结合起来(陈福康,2002:70)。

第三次翻译高潮兴起于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前后时期,持续约八十年。在此期间,中国从一个闭关自守的封建社会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门被西方的坚船利炮轰开。爱国志士意识到了国家的积弱,亟切希望向西方学习科技,借鉴西方先进的思想,“师夷长技以制夷”。这是史上中西民族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第一次全方位的交流,国人有机会接触了大量的西方自然科学知识和各流派思想,白话文开始取代文言文,并从

外语吸收了大量新词语。翻译再次活跃繁荣,并激活了热烈的译学讨论。大量学者,包括梁实秋、严复、林纾、鲁迅、周作人等,在写作的同时也积极参与翻译,且留下了大量个性鲜明的精彩译论,极大丰富了中国译论研究。

三次翻译高潮标示了中国翻译研究一个从无到有,从简到繁,从本能到自觉的发展过程。佛教翻译时代好比是启蒙时代,此时的中国译论虽然缺乏理论建设的自觉性,只有零星散论,但毕竟开启了译学研究的滥觞。第二次翻译高潮规模不大,比较佛经翻译时期的译论,却融入了中国传统文论的大系统(参见陈福康,2000)。这一点变化不容小觑,因为这意味着中国译论从此开始体系建设,启动了译学研究的自主意识。第三次翻译高潮在规模和持续时间上或许不如佛经翻译,涉及的领域却更广阔,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更直接,对翻译理论的探讨更深入,明显成熟了很多,开始具备了自觉的理论建设意识。

自第三次翻译高潮以来,中国翻译研究经历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和建国初期两个比较活跃时期。至此,以傅雷的“神似论”和钱锺书的“化境说”为标志,逐渐形成了比较成熟的译学体系,表现了与中国传统文论一脉相承的浓郁诗学气质。

本来可以依傍着中国传统文论这棵大树继续恣意蔓生的中国翻译诗学,在改革开放掀起的第四次翻译高潮中受到了西方译论的极大挑战。西方译论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中西文化交流的浪潮蜂拥而至,令人眼花缭乱。西方译学理论有完备的语言学理论支撑,严谨周密,理性十足,相比之下,点评式、感想式和随笔式的中国传统译论显得主观随意,散漫模糊,缺乏理论的威严,因此备受诟病,人们不能不开始反思。

挑战也意味着机遇。历史上的三次翻译高潮还证明,中国传统翻译诗学绝非一个封闭静止的系统,它是开放的,与社会大系统及其子系统相互依存、相互影响、不断发展。面对西方译论的涌入和挑战,中国传统译论表现出极强的兼容性,经历了三十多年改革开放后的今天,中国翻译学与传统的翻译诗学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首先,视野更开阔。译学研究出现了大量新视角和新的思维方式。大量与语言有关的学科,如语言学、认知学、社会学、哲学、心理学等,都被用于翻译研究,开辟了传统翻译研究从未涉及的领域;大量新概念进入译学研究视野,如语用、衔接、连贯、主述位、认知、隐喻、主体性、目的论、操控论、对等论等。正是在这一更广阔的视野中,出现了多元翻译标准论,标示着人们对翻译的本质有了更深刻、更系统的认识。

其次,研究内容丰富。文学翻译、实用翻译、对外宣传翻译、法律翻译、口译等诸多领域,翻译研究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研究领域的区分也更细腻深入。如传统译学注重语境,提倡译者做杂家,现代译学对语境的研究则着眼文化、意识形态、文体学、美学、心理学、社会学等更多的视角,其理论的丰富,研究的细微,途径的繁复等,都远非传统译学所能比。

最后,中西结合日益成熟。改革开放初期,中国译学界面对从未接触过的西方译论,多少有些生搬硬套。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逐渐了解西方译论,对中西译论的差异也有了更多的认识,于是,更多地采取了洋为中用,取我所需的态度。

十年前,中国译界为翻译学的名与实有过一场大讨论。人们习惯了传统译学的思维,对翻译学这个“学”似乎很不适应,普遍不大认可。十年后的今天,翻译学在中国译界作为学科名称已经逐渐用开,全国很多外语院系设立了翻译本科专业,不少学校还健全了

从本科、硕士到博士生培养的完整教学体系。作为一门学科，有专著，有翻译行业协会，还有翻译专业杂志等，这些似乎都说明，翻译学在中国已然建立。

不过，细究起来，汉语的翻译学这个“学”字在折射了翻译研究上述变化以外，更多的是表现了汉语的包容性和写意特点。一个“学”字，既有容纳理性十足的西方理论蕴意的空间，也具备《红楼梦》红学研究那种充满感性的松散性。这个名称体现了中国传统译学的进步，也蕴含了与西方理论意义上学科的不同，譬如与西方物理学、经济学等这类学科的“学”相比，其内涵似乎有所不同。换言之，中国语境下的翻译学仍带着浓重的传统诗学色彩，这表现在：1) 没有统一的理论体系。以点评式、感想式和随笔式为特征的研究范式仍占主流；2) 中国传统文化和文论的隐喻系统仍支配着中国译论；3) 尽管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早已不是和风细雨，而是暴风骤雨，中国译论的根仍深深扎在中国文化的土壤之中。

本书的时间跨度逾十年，内容涉及翻译标准、翻译思维、散文节奏翻译、中国传统翻译诗学的文化通约性、形合与意合的平衡、翻译中的虚实、翻译的取与舍、政论文的文采与翻译、翻译与连贯、葛浩文的翻译、文学翻译的客观性等等，论题很杂芜，没有一个能覆盖所有论题的单一的理论体系可用，讨论文本的连贯翻译用了语篇理论，讨论翻译思维时采用了认知隐喻理论，讨论翻译的客观性用的是信息理论。这些理论原本不是翻译理论，只是为研究翻译而借用过来。虽然论题反映了作者的偏好，但多少也能反映这些年来译学研究的特点和译界研究的普遍倾向。

中国传统译论借用了传统文论的很多概念，如神、气、神韵、境界等。这不是简单的借用，因为这些概念在中国文化大系统中实际上构建了一个隐喻体系，该体系并不是孤立的，它在中国文化大系统中具有通约性。因此，中国传统译论的隐喻体系源自文论就不足为奇了。傅雷的“神似”论、钱锺书的“化境”说，还有许渊冲的“美化”和“三美”论等，都与文论有或直或曲的渊源，而且都为当今翻译学研究所耳熟能详。我们今天说的翻译学虽然有了语言学理论和心理学、社会学、生态理论等丰富的学养资源，它仍没有脱离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论和传统译论的本性。

中国传统译论的诗学特质是如此根深蒂固，面对潮水般涌入的西方译论，中国的翻译学没有全盘照搬西方译论，也没有依葫芦画瓢，而是取己所需，充实自己，在丰富自己体系的同时，没有抛弃传统体系。

我们如此评价中国的翻译学，没有复杂的原因，也不带任何意识形态或狭隘民族主义动机，关键是考虑到翻译既是语言交际。研究翻译怎么可能不顾及所涉及的语言特质呢？在中国语境下研究英汉或汉英翻译，必然受到汉语的影响，必然要受到汉语言和汉文化的约束，这就注定了中国的翻译学与西方的翻译学既有契合一致，也会有扞格不合。所以，我们认为，中国传统翻译研究通过几十年的发展。

虽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我们更愿意称这些变化为嬗变。“嬗”“禅”相通，有传递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翻译研究仍在改革变化之中，研究内容更丰富多彩，翻译学的名称被接受了，而变化中蕴含了传承，今后会变到何等程度很难预计。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只要汉文化和汉语语言不变，中西方翻译的特质就不会变，翻译学的根就仍会深深扎在中国文化的土壤中，枝繁叶茂，常青常绿。

◎参考文献

- [1] 陈福康. 中国译学理论史稿 [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2.
- [2] 朱志瑜. 翻译研究的学科建设中的几个问题. 见杨自俭: 翻译新探 [M]. 青岛: 青岛出版社, 2002.
- [3] 马祖毅. 中国翻译简史 [M].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98.
- [4] 张经浩. 翻译学: 一个未圆且难圆的梦 [J]. 外语与外语教学, 1999 (10).

二、翻译学：有名无实

1. 问题的提出

丰富多彩的西方译论为我们提供了思考的多元化参考，促使我们反思：为什么“整个翻译理论界对‘翻译学’是否能建立起来，尚无一致意见”（彭长江，2001）。Tytler 提出三原则（1790）已逾两百年，严复的“信达雅”已逾百年，霍姆斯译学体系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初便已形成，80 年代再次被提出；董秋斯（1951 年）呼吁建立中国翻译学，黄龙（1988 年）发布《翻译学》，谭载喜（2001 年）发表《翻译学》。人们呼吁力争，结论依然是：译界普遍认为“翻译学”至今并未建立（张经浩，1999）。翻译学的名称有人用（张美芳，2000；张南峰，2000），更多的却是冀盼。笔者认为每门学科的形成都因其内在价值和规律而自然形成，不大可能人们觉得必须有门“学”时便能建立一门“学”。“人类任何有意义的行为都隐含了一定的理论”（陈向明，2000：318）。作为人类复杂的交际活动翻译无疑有理论。问题是刻意构筑一个赫然的翻译学体系与顺应翻译研究本来状况称翻译理论为翻译研究是有本质区别的。这不只是名称问题，它涉及对翻译理论本质的认识。本文试从翻译理论与语言及思维的关系角度就此提些看法。

2. 翻译与语言

翻译过程大致分三个步骤：1) 理解源语；2) 源语与译文比较，确定对应关系；3) 用目的语表达。三个步骤都无法脱离语言的具体操作。翻译活动的这一本质决定了翻译与语言不可分割性。

语言渗透于人类一切社会活动。作为交际活动之一，翻译很自然与众多的知识学科，尤其是涉及语言的学科互相关联，或是翻译文本内容涉及众多学科，或是翻译自身研究有赖于语言或与语言相关的学科，譬如语言学、心理语言学、文学、美学、文体学、社会学等，都从不同角度或多或少可以阐释翻译现象，指导翻译活动，从而影响翻译质量。语言像条纽带，把翻译与众多的学科联系起来。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各学科之间相互关联、重叠的现象屡见不鲜，但多不失各学科的独立地位。譬如数学应用领域极广，数学却没有融入其他学科，数学还是数学。翻译似乎特殊：与语言密切相关，研究语言转换，却既没形成一门翻译学，也没形成新的翻译语言学。从佛经翻译算起，我国的翻译史已近两千年（沈苏儒，1998：16），可至今人们仍在呼吁建立翻译学！其内在原因：翻译理论缺乏自己独立的体系。翻译活动对语言的依赖关系使翻译学无法形成西方传统意义上的

“学”。

语言可以用于研究语言本身,如语言学。也可以作为载体,传达语言之外的信息,如文学。没有语言,文学便不复存在。凭借语言,文学得以形成。若抽掉语言,翻译也不复存在。但借助语言,却不见翻译学,因为翻译这一活动的性质是:译文必须忠实地传达文本原作者的信息或思想。译者的创造性局限于语言技巧运用上。这是翻译之所以特殊的一个关键。翻译涉及文本阐释、语言运用、文体效果,涵盖人类知识众多学科,而这些学科无不具有独立的研究领域。我们要构建的“翻译学”实际上不得不依赖这些学科理论。除了翻译过程中的语言转换技巧,很难找出纯属翻译领域的理论研究范畴。

随着研究的深入,翻译研究范畴确实有超越纯语言技巧的内容,譬如意识形态的操控、译者的主体性、翻译目的、文本文化内涵及阐释、机器翻译等。然而,这些似乎还不至于从根本上影响到翻译理论是依附在语言及其他学科理论之上这一本质。Vermeer的“翻译目的论”不涉及翻译的微观操作,也不针对任何特定语言文化(陈小慰,2000)。实际上“目的论”强调译文应该在分析原文的基础上,以译文预期功能为目的……根据各语境因素,选择最佳处理方法(同上)。译者出于不同翻译目的,选择最佳处理方法必须根据历史环境、政治观点、原作者意图等众多因素。也许其中某一步骤可以与具体的语言转换无关,但最终还是离不了分析原文和语境。译者在确立译文目的时,不能不考虑不同转换手段达到的不同译文效果。这大概还是称不上纯理论。对语言的这种依附关系导致了翻译与其他学科的依附关系,使翻译理论终究还是处于寄生的地位,研究潜力上缺乏独立性,无法形成真正属于自己的“学”。翻译学的难产就不足为奇了。

霍姆斯认为,翻译学应该是一门基于经验的学科(Holmes, Toury, 2001: 9)。经验只能来自对双语转换中语言现象的观察。换言之,翻译理论无论是冠以翻译学,或翻译研究,都得以语言现象为基础。只要离不开对语言的依附,就离不开对其他学科的依附。西方译论与中国传统译学理论在形态上有明显差异。前者形态相对丰满多样,“论”目繁多,体系庞大,颇显一“学”之气势,这是表面现象。本质上,西方译论也摆脱不了语言的制约。从这一点看,中西方译论实无优劣之分,只有形态之异。而导致形态差异的根源则是英汉民族思维模式的差异,绝非是译学本身具有独立体系,而该体系已经被西方人发掘了,却没有被国人发掘到。

3. 翻译理论的民族性

语言与思维的关系使翻译理论不可避免地打上民族思维的烙印。这一点对认识翻译理论的不同形态至关重要。我们说的形态,指的是理论研究中的视角(perspective)或途径(approach)。鉴于翻译活动与语言及思维的特殊关系,翻译的客观规律不是一套理论体系或一个模式所能涵盖的。只有从不同视角和不同途径来研究,才可望对翻译活动本质有客观全面的认识。而这些视角和途径因人而异,很难人为地制定或预测。从民族思维特性来观察翻译就是一个极重要的视角。理论有民族性。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说明中国的社会主义理论有中国特色。汉英互译不可能不受汉英语言民族的思维模式影响。否认这一点,无异于否认语言差异。没有语言差异,便无翻译可言。翻译受语言制约,就必

然受到该语言民族思维模式的影响，形成相应的理论形态。西方语言思维模式影响西方译论，汉语言民族思维模式也影响汉语言译论形态。由此产生中西方译论之差异。

“所谓理论，究其本质，都是人类对世界的探索过程中部分认识的系统总结”（朱纯深，2000）。既然是人的认识，因人而异和因民族而异就是很正常的了。各民族的人种、心理、历史、地理客观环境等都不尽相同，不同的环境与人的身心经过“千百万年的相互作用”而形成不同的思维模式。思维与语言相互依存，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洪堡特）。语言不可能脱离民族模式的支配和影响，因此，英、汉语言民族的思维模式差异是很大的。后者长于形象思维或直觉思维，前者属理性分析型。体现在语言上，汉语言简意赅，少用连接成分；英语注重形满，每个成分到位方成其为句，衔接连贯，形式严密，缺一不可。作为表意文字，汉语因其“表意而与概念直接联系”（申小龙，1996：327）。因而汉语民族思维简捷、高度凝聚，文字与概念之间无须额外的思维过程。作为拼音文字，英语“因其拼音而与概念保持着距离”，字面上与概念没有直接意义，这就要求思维过程中有分析过程，从而促成一种重“形”、长于思辨的演绎性思维模式。在理论上往往可以从一个观点演绎成一个扇面形论述，容易形成一本本专著，曰理论体系。西方翻译理论便具有这种特征。“等效”论、“交际与语义翻译”、“目的论”、“多元系统化”、“关联论”等，接连不断，其实都是翻译理论的不同侧面（perspective）。汉语言思维则偏重归纳模式，善于从众多材料中归纳出一个言简意赅的结论。因而有“诗言志”、“文以载道”这类精练的文论形态，也有“信达雅”这样简略的译论。这便是中外译论形态差异的思维根源所在。思维模式的影响从一个重要方面揭示了翻译理论形态构成特征。正是西方语言民族思维模式的影响，西方译论才呈现出多种形态，而多姿多态的译论反过来证明翻译理论并不只存在着单一的，比方说霍姆斯式的译学体系。也揭示了中国译论形态存在的必然和合理性。“信达雅”为什么持续百年而不衰？虽是“微言”，却蕴藏“精义”。它有深刻的汉语民族思维根基，不是简单的“评点式的经验之谈”。

中国译论是人类翻译活动现象中的客观存在，不与世界其他译论比较也存在。进一步发展我国翻译理论不等于拒绝西方译论，也不等于置中国译论于世界译学大系之外。中西方译论与人类语言一样，有共性也有特性，都反映了翻译活动的某些共性。“信达雅”与 Tytler 的三原则就有相似之处。否认特性就是否认共性，两者是辩证的关系。有特色不等于没有短处。论者云，比较西方译论，中国传统译论过多拘泥于微观操作的应用理论。这有一定道理，但原因在于客观的民族思维差异，而不在于汉民族或中国译论家们的主观自大。中西方译论都是基于各自民族思维模式之上的，也都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唯一体系。中西方译论应该互相借鉴。站在这样的立场来审视中西方译论，我们就能理解翻译理论的常态就是多形态的、开放的，振臂呼吁很难呼出一门翻译学来。

4. 翻译学名与实

翻译理论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问题是，人们认识上似乎有一误区：不称翻译学，翻译便显得没理论、没地位。这便导致彭长江指出的“框架过于宏大”问题（彭长江，2001）。在谈到翻译标准问题时，辜正坤说得对，出于“我们思维方法上的单向性或定向

性,我们习惯于形式逻辑推理,习惯于认为一事物不是A就是B,习惯于说:道路只有一条,答案只有一个,等等”(辜正坤,1989)。在对待翻译学的问题上,人们似乎也存在类似的思维定势。为什么非要追求一个包罗万象的翻译学呢?连“人肚子饿了要吃饭也可以是理论”(陈向明,2000:325)。翻译理论,无论是专著,或格言模式,无论是称作“翻译学”、“翻译研究”抑或“译学研究”,只要对翻译现象有解释力,对翻译实践有指导意义,不都可以纳入翻译理论的范畴么?“功能等效论”、“语义和交际翻译”、“语言学翻译理论”、“解构主义翻译思想”、“信达雅”、“神似论”、“化境说”、“译文竞赛论”,等等,林林总总,都揭示了翻译活动的规律,都有合理性,都是翻译理论。而翻译理论的这种多形态现象不是人为努力能否认或改变的,是翻译与语言和思维的关系决定了它们的形态。

翻译理论是一种“柔性范畴”,即“依托非逻辑的互渗律,讲究综合,重视功能,由此确立的范畴具有亦此亦彼的多元征象”(汪涌豪,1999:2)。因而,翻译理论自然形成了纷繁杂呈、相互包容的形态。这些形态不妨分为三大块:语言学派、文艺学派、跨文化交际学派。语言学派翻译理论可以从转换生成语法、社会语言学、符号学、话语分析理论、文体学等角度来对源语及译文文本条缕析,从而加深译者对源语和译语字词、句篇各层级的语义、语用意义、风格的理解,判断译文的准确性;文艺派翻译理论则可根据文学文本侧重文本风格和神韵的传译,更多从修辞、审美和译者主观审美创造性角度考察翻译过程和译文效果。随着国际交往增多,跨文化交际对比在语言研究中日益受到重视。译者若不了解文本的文化内涵,往往不可能作出确切的翻译。但任何文化现象都离不开语言载体。因此,跨文化研究纳入翻译范畴后,也摆脱不了语言的羁绊,使译论成为纯翻译学。它不过是以语言与思维为基础的另一译论形态。此外,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能在接受理论中找到根据。Vermeer提出的“目的论”能在阐释学中找到踪迹。“原则上,翻译理论的种类和数量是无限止的。科学每前进一步,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每加深一层,都有可能更新人们对翻译问题的看法,提出新的翻译概念,产生新的翻译理论”(谭载喜,1994:303)。换言之,翻译研究是开放性的多形态理论体系,不是某个单一的“学”或“体系”能替代的。

翻译理论有三项职能,一是认知职能,提供对翻译的客观规律性的宏观描写以及对这些规律的内在联系及其作用机制的深层分析;二是执行职能,使译者“凭借翻译理论的科学论证及方法论的引导,在实践中应能有选择地‘实施’翻译理论所提供的‘参照性指令’”;三是校正职能(刘宓庆,1999:2-3)。据此,现在一切形态的译论都可以称之为理论。建构“翻译学”,若仅为其名是一回事,若试图将呈散漫状的各理论总合成一个体系则大有问题。首先,翻译研究借用的各门学科理论本为独立学科,并非专为翻译而形成。某一理论若能解释翻译现象,这并不改变该理论的本来目标及性质。创立翻译学,不等于将一堆理论总合为一个系统,冠以翻译学之名即可。该体系未必能形成一个有机系统。此外,构建一门“学”,必须有确实需解决的问题。翻译领域有大量问题需要解决,但绝不缺相关理论解决。语言与翻译的关系足以说明,翻译活动与翻译研究很难分开,两者是一个完整的体系。有不少论者试图将两者分开以构建翻译学(张美芳,2000)。以霍姆斯的译学体系为例,他将翻译学分为三大分支:描写翻译研究;翻译理论;应用翻译研



究。给翻译学定了两个主要目标：(1) 描写客观翻译现象；(2) 建立解释、预测翻译现象的原则和参数体系。且不说这一参数体系的预测多玄乎，有多大的可操作性，就说这一构想已逾 10 年，该体系符合翻译发展规律，想必早已广为接受了。事实上非也。这恐怕不能归咎于国人闭关自守。问题还在翻译学本身，在于语言在人类社会活动中的广泛渗透性，在于翻译的多学科性以及其它学科对翻译研究强大的补充性。霍氏没有把其它学科摆进他的译学体系是明智的。也许他意识到了若摆进去，事实上就否定了他的译学体系存在的必要性。只是他还明智得不彻底：即使不摆进去，独立不起来仍是客观事实。有心人不妨分析一下他的体系，哪一分支不借用其它学科理论呢？将其它学科理论总合一下，然后称之为翻译学，其意义实在不大。实际上只会是一种总合其它学科理论的工作。违背学科客观发展的努力是徒劳的。翻译学之名，用 R·阿埃瑟朗教授的话来说，“就目前而言，‘翻译学’只能看作不同途径、角度和方法的翻译理论研究的一种总称”（许钧，1996）。也就是说，有名无实。

5. 结 语

事物都有自身的发展规律。“纯理论凭空构建‘翻译学’，不仅是不可能成功的，也是没有什么价值的”（A·阿埃瑟朗）。我们应当承认翻译理论的自然形态，不必人为地构建一门翻译学。“人为”指的是违背学科发展的规律而为之。一门学科的地位高低，是由其性质，而不是名称决定的。翻译学科的地位的确不够，但这与它自身的性质，与历史渊源有关。历史上，国际交往少，翻译相应地不大重要。随着经济全球化，翻译的重要性逐步显现。将翻译学科地位不够归咎于缺乏翻译“学”，未免牵强。至少就目前而言，翻译理论的自然形态还不是热心的学者们构造的体系。倒是“Translation Studies”这一名称的复数形式名副其实地反映了理论上的多形态。但这与人们呼吁的翻译学有本质的区别。

◎参考文献

- [1] Toury Gideon.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
- [2] 陈小慰. 翻译功能理论的其实 [J]. 中国翻译，2000（4）.
- [3] 陈向明. 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 [M].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
- [4] 蔡毅，段京华. 苏联翻译理论 [M].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
- [5] 张经浩. 翻译学：一个未圆且难圆的梦 [J]. 外语与外语教学，1999（10）.
- [6] 张美芳. 翻译学的目标与结构 [J]. 中国翻译，2000（2）.
- [7] 张南峰. 特性与共性 [J]. 中国翻译，2000（2）.
- [8] 辜正坤. 翻译标准多元互补论 [J]. 中国翻译，1989（1）.
- [9] 郭建中. 当代美国翻译理论 [M].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
- [10] 许钧. 一门正在探索中的科学——与 A·阿埃瑟朗教授谈翻译研究 [J]. 中国翻译，1996（1）.

- [11] 罗新璋. 我国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 [A]. 翻译研究论文集 [C].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84.
- [12] 彭长江. 也谈“翻译学”的建立. 2001 年青岛全国译学学科建设专题讨论会论文.
- [13] 谭载喜. 试论翻译学. 见: 杨自俭. 刘学云. 翻译新论 [M].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4.
- [14] 沈苏儒. 论信达雅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8.
- [15] 申小龙. 文化语言学论纲 [M]. 南宁: 广西教育出版社, 1996.
- [16] 刘宓庆. 当代翻译理论 [M].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99.
- [17] 汪涌豪. 范畴论 [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9.
- [18] 朱纯深. 走出误区 踏进世界 [J]. 中国翻译, 2000 (2).

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

(1) 2001 年